

白领新移民的地位认同偏移及其原因分析

雷开春

摘要：本文运用2007年上海城市新移民调查数据，对白领新移民的地位认同偏移现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白领新移民在客观上处于社会中下层，在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上呈现出一致认同、向上偏移、向下偏移和模糊认同四种倾向；其中女性、已婚、年龄小、高收入、低教育程度、拥有本地户籍证明、居住时间长的白领新移民比其他人更可能表现出地位认同向上偏移的倾向。这一结果体现出移民的特殊社会境遇及群体社会地位对白领新移民主观社会地位判断的显著影响作用。

关键词：白领新移民 地位认同 认同偏移

一、研究背景

（一）地位认同偏移现象及其研究

客观分层对阶层认同和阶层意识的影响，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形成在于人们的“阶级立场”的产生，即基于阶级境遇所产生的阶级觉悟、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刘精明、李路路，2005）。S·奥索斯基认为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分层的想象应作为阶级分析的重要方面，它表明了不同阶级利益的实践经验，直接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计划的推行（Ossowski, 1963: 6-7, 转引自刘精明、李路路，2005）。事实上，客观社会地位只是他者的衡量指标，作为能动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对社会地位的认同可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因为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是一种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意识、评价和感受，阶层意识的基础不仅是物质经济利益的差别，还可以建立在经济、权力、文化等各种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基础之上（Jackman et al., 1973: 569; 刘欣，2001）。作为阶层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观阶层认同（status identification）反映的是“个人对其自身在阶层结构所处位置的感知”（Jackman et al., 1973: 569），它构成了阶层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难怪倾向于“阶级已经死亡”的学者会认为，“个人主义化”以及当代大量新社会问题和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导致基于传统阶级结构基础的群体认同和阶层意识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基于个人主义基础的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以及人们基于生活方式、价值认同和社会规范的问题对于新社会运动的关注（Touraine, 1981; Eyerman, 1992; Haferkamp & Smelser, 1992; Clark & Lipset, 1996; 转引自刘精明、李路路，2005）。谢立中（2008）也曾将社会学中现有的种类繁多的“阶级”或“社会分层”分析模式，按其理论取向粗略地概括为客观主义取向的社会分层模式和主观主义取向的社会分层模式两大类，但无论是“客观分析法”，还是“主观分析法”，如果我们按照它们的倡导者们原来所阐述的那种性质来理解它们，把它们看作是对纯粹给定的“社会分层”（之“客观”或“主观”）状况的再现，都有可能造成对分析结果的误解。因此，将主客观分层共同纳入研究，可能比单纯的客观分层或主观分层研究更能深入地反映社会分层现象。

已有许多学者对中国民众的主客观地位之间的偏差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许多研究基于地方性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例如，1996年武汉市民的调查数据显示，认同中等偏下层的比例明显偏高，并且表现出权力地位认同向下偏移与声望地位认同向上偏移的倾向（刘欣，2001）。1999年

上海居民的调查数据,表明大部分调查对象都把自己的家庭看作是中间或中间偏下的阶层(仇立平,2001)。2004年在浙江省进行的“四类村庄社会分层的个案比较研究”调查,表明村民的主观地位认同与客观地位分层在总体上具有一致性,但在这种总体一致性下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部关系:对于中间层次的村民来说,其主观地位认同与客观地位分层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减弱,呈现明显的“趋向中层”;而对于上层和下层的村民而言,其主观地位认同发生了明显的偏移,分别呈现出“向下偏移”与“向上偏移”的趋势(卢福营、张兆曙,2006)。2005年东北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所有的调查对象中没有社会成员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上层,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归属于中层或下层的位置,因而整体呈现出一种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现象(董运生,2006:80)。此外,也有一些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出我国公民的整体阶层认同状况。例如,“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在2002年的全国性调查数据,通过主观阶层认同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而这种向下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而主要表现为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数偏少,而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数相对较多(赵延东,2005;李培林,2005)。2006年3月至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众认为自己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上层”的仅占0.5%,属于“中上层”的占5.4%,属于“中层”的占39.6%,属于“中下层”的占29.1%,归入“下层”的占24.5%,这表明,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出现普遍偏下的情况(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6)。也有人对中产阶层的阶层认同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就中产阶层而言,在主观阶层地位上认同中间层的人,显著高于工人和其他低阶层的认同,同时也较社会上层认同的比例为低(刘欣,2007)。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民众表现出普遍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倾向,但不同地区、阶层或职业的居民的阶层认同可能存在差异。

关于我国民众表现出的主客观阶层偏移现象,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例如,刘欣(2001)运用声望资源的阶梯式分配结构和权力资源的二分模式分配结构来分别解释武汉居民的“权力地位认同的相对剥夺感”和“声望地位认同的向上‘攀附’倾向”。卢福营、张兆曙(2006)认为“怕富心理”、“致富经验自省”、“参照对象设定”等因素是影响浙江省上层村民阶层地位认同“向下偏移”的主要原因;而与过去穷苦日子的纵向比较,以及与其他内陆农民的横向比较是产生他们向上偏移的主要原因。李培林(2005)和赵延东(2005)均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角度来理解我国民众阶层认同总体向下偏移的现象。董运生(2006:80)认为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现象与我们国家长期形成的中庸之道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已有文献资料表明,我国学者更关注的是主客观一致现象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对这一现象本身的理解则大多停留于现状描述和理论分析的层面上,缺乏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的支持。更为遗憾的是,移民,尤其是中层移民的主观阶层认同及其与客观地位分层之间的关系还一直未能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二) 移民的社会地位及问题提出

与其他分层形式一样,群体地位分层也是旨在考察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化体系。几乎在所有的多族(群)社会,都会出现对各个族(群)的等级安排,在这种等级安排中,某个族(群)确立起了其支配群体地位,并拥有形塑族(群)关系的最大权力。而处于从属位置的族(群)只能根据他们在等级中的相应地位行使较少的权力;至于处于最底层的群体,他们也许拥有很少的权力,或者压根就没有什么权力(麦格,2007:36)。此时,群体的等级主要是由各群体与支配群体的文化以及身体特征的差异的大小决定,社会学家把这一分层体系称为“多数-少数”(majority-minority)或支配-从属(dominant-subordinate)体系。关于移民的群体地位,学术界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按照路易斯·沃思的经典定义,少数人群体是这样“一群人,由于他们的身体或文化特征,从而区别于社会中的其他人,并且受到有差异且不公平的待遇,因此这些人认为自己受到了集体歧视”(Louis Wirth, 1945: 37, 转自麦格, 2007: 36)。少数群体的大多数成员从事低

等的工作,收入微薄,生活环境恶劣,接受劣等教育,权力较小,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遭遇歧视。国内移民(主要指农民工或城乡流动人口,我们称之为蓝领移民)研究也大多沿用了这一思路,将迁出于农村的蓝领移民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其与迁入地居民之间的各种差异: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少数群体,在城市中的蓝领移民的生活状况受到了较多关注。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蓝领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他们往往停留在非正规部门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以低收入、工作不稳定、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障和体力性劳动作为特征,被城市人当作异类(蔡昉,1996;李春玲,2007;张永丽、黄祖辉,2008)。尽管曾有人提出“底层精英”的概念(李强,2002),但像家庭出身背景、人力资本投资、工作资历的积累、受雇于好单位等现有制度安排里的常规社会流动路径,几乎都无法帮助农民工摆脱其底层的社会地位,这可能是大多数学者并不关心农民工主观阶层认同的原因。

显然,少数人群体地位的概念并不能很好地用来分析白领移民。尽管大多数移民的个人社会地位受群体地位的影响,处于一种劣势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但部分移民仍可以通过个人特质和成就来提高其个人社会地位,这是人们摆脱少数人地位(待遇)的常用策略。正如李春玲(2006)所说,“流动人口必然经历较多的工作变动和克服较多的阻碍才能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但同时,由于他们更为努力地寻求上升流动机会,或者说更加渴望改善自身地位状况,他们遭遇下降流动的可能性又少于非流动人口”。在国际移民中,这部分人被称为“中间人群体”(middleman minorities)。已有国际移民研究表明,中间人群体通常在经济系统中占据中间地位,既不是处于顶层的资本家(其成员主要来自支配群体),也不是处于底层的劳工大众(主要是从属群体的成员);他们主要是商人、店主、放债者以及独立的专业人员等从业者(麦格,2007:43)。进一步来看,在国际移民中,“中间人群体对于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都具有某项功能,他们既能从事那些支配群体认为令人反感或缺乏声望的经济工作,同时又经常给那些缺乏技能和资源的少数人群体提供商业和专业服务”(麦格,2007:43)。而国内白领移民大多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能够进入正规经济部门和一级劳动力市场,成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职员(仇立平,2001;李友梅,2005;刘精明、李路路,2005),无论群体地位还是个人地位,都可能高于国际移民中的中间人群体,与蓝领移民也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我们不能沿用蓝领移民的地位研究视角,来分析白领移民的社会地位问题。

如果说,蓝领移民的现实境遇使他们缺乏提高主观社会地位的客观资本,出现认同不一致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对于这些在客观社会地位上获得成功的白领移民来说,他们会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判断会不会出现认同偏移现象呢?偏移的方向如何?偏移程度如何?哪些因素会影响其认同偏移呢?本研究将通过对2007年上海城市新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设置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上海大学张文宏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新移民问题研究》(05BSH054)课题。调查工作从2007年4月初开始,到5月底完成;调查员由社会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构成,在访谈前经过了系统的专业培训;调查对象的选择采用了受访者推动抽样(RDS)方法,以1992年后来沪的白领移民为主。通过删除作为参照群体的蓝领工人样本,得到有效分析样本557份(雷开春,2008;张文宏、雷开春,2008)。样本的基本构成情况与夏建中、张达(2003)对北京白领群体的调查基本一致,但我们的调查中普通白领的比例远大于管理人员,这是考虑到外来移民在短期内晋升为管理人员的比例不多。

(二) 变量设置

地位认同偏移指主观地位认同与客观地位分层之间的差异，地位认同偏移的测量离不开对主观地位认同的测量与客观地位分层的测量。关于客观阶层的划分标准，学者们有过相当多的讨论，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的社会阶层理论为主。然而，采取什么理论或标准来描述或划分社会阶层，取决于研究者对“社会”的认识或价值判断。从总体来看，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稳定时期，因此对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研究，采用多元的社会分层理论比较适合（仇立平，2001）。大多数社会分层的研究都与职业有关，但有关研究多从职业声望或职业的经济地位考察职业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丹尼斯·吉尔伯特等，1992，转自仇立平，2001）。职业是联系社会阶层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结合点，它一方面与社会阶层深层结构中的财产所有权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社会阶层的表层结构相联系（庞树奇、仇立平，1989）；不同职业所具有的社会声望、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财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别。仇立平（2001）的研究表明，人们对各种职业的收入、权力、声望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职业地位是社会分层的有效指示器。李春玲（2005：193－194）也提出了客观职业声望综合指数，其中考虑到了教育因素、权力因素、收入因素、部门因素和社会歧视等五个维度，得到的回归方程的解释力达到了0.81。因此，本研究的客观地位分层根据李春玲的模型计算而来，其中考虑到了收入、教育程度、权力、单位性质和职业性质等因素。具体模型为：客观职业声望 = 11.808 + 3.349 * 教育年限 + 0.573 * 平均月收入（百元） + 16.075 * 高层管理者 + 11.262 * 中层管理者 + 3.738 * 基层管理者 + 8.942 * 党政机关 + 16.841 * 事业单位 - 5.694 * 企业单位 - 26.655 * 受歧视职业；其中受歧视职业在本研究中特指农民工。然后将职业声望 ≥ 80 的人归类为上层；60 = < 职业声望 < 80 的人归类为中上层；40 = < 职业声望 < 60 的人归类为中层；20 = < 职业声望 < 40 的人归类为中下层；低于 20 的人则归类为下层（李春玲，2005：193）。关于主观地位认同的测量，研究者们基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渡边雅男，1998：333－334；李春玲，2003；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课题组，2004），基本上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阶层。本研究将主观地位认同操作化为“您个人的综合经济地位在上海大体属于哪个层次”：（1）上层；（2）中上层；（3）中层；（4）中下层；（5）下层；（6）说不清。因此，认同偏移 = 主观地位 - 客观地位，正数表示向上偏移，负数表示向下偏移，0 表示一致认同。

此外，根据前人研究（李强，2000；仇立平，2001；李春玲，2003/2004b/2005；刘精明、李路路，2005），结合移民自身的特点，我们将主要考察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户籍、职业、教育水平、经济收入、居住时间、迁出地区和家庭出身等变量对白领新移民地位认同偏移状况的影响作用（变量分布见表 1）。

表 1 研究中使用变量的分布情况

	变量	频数（%）		变量	频数（%）
性别	男性	303（54.4）	收入水平	收入高	182（32.7）
	女性	254（45.6）		收入低	375（67.3）
年龄	年龄大	179（32.1）	居住时间	时间长	193（34.6）
	年龄小	378（67.9）		时间短	364（65.4）
婚姻状况	已婚	204（36.6）	迁出地区	小城市及农村	175（31.4）
	未婚	353（63.4）		大中城市	382（68.6）
户籍类型	本地户口	233（41.8）	职业类型	私营企业主	38（6.8）
	居住证	110（19.7）		管理人员	57（10.2）
	其他人	214（38.4）		技术人员	188（33.8）
家庭出身				普通白领	274（49.2）
	农民家庭	186（33.4）	教育类型	研究生	137（24.6）
	其他家庭	371（66.6）		本科类	355（63.7）
				未受高等教育	65（11.7）

N = 557

三、结果分析

(一) 白领移民的地位认同偏移现状

表2首先列出了白领新移民主客观地位分层的对比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主观地位分层上，认同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白领新移民分别为12.2%（68人）、34.3%（191人）、33.4%（186人）、4.1%（23人）和0.4%（2人），此外有15.6%（87人）处于地位模糊认同的状态。在客观地位分层上，本研究选取的绝大多数白领新移民（499人，89.6%）属于“中下层”，仅有一成多的人（58人，10.4%）属于中层及以上阶层。这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白领新移民在客观分层上处于“中下层”，在主观阶层认同上主要集中在中层和中下层。

阶层归类	主观认同		客观分层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下层	68	12.2	0	0
中下层	191	34.3	499	89.6
中层	186	33.4	33	5.9
中上层	23	4.1	22	3.9
上层	2	.4	3	.5
模糊认同	87	15.6		
N = 557				

为进一步揭示白领新移民阶层认同偏移的具体情况，我们对白领新移民的偏移等级进行了计算（模糊认同者除外），具体情况见表3。从中可以看出，有39.6%（199人）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一致认同的倾向；向下和向上偏移一个等级的白领新移民分别为17.5%（88人）和32.0%（161），只有1%（5人）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向下偏移2个等级；向上偏移两个或者三个等级的白领新移民也非常少（3.4%，17人）。这一结果表明，白领新移民主要表现为“一致认同”、“向上偏移”、“向下偏移”与“模糊认同”四种倾向，其中“向上偏移”几乎是“向下偏移”的两倍，但偏差程度并不十分严重。

表 3 白领新移民的地位认同偏移情况			
偏移等级 *	人数	百分比	认同偏移 (%)
- 2.00	5	1.0	93 (18.5)
- 1.00	88	17.5	
.00	199	39.6	199 (39.6)
1.00	161	32.0	
2.00	15	3.0	178 (35.4)
3.00	2	.4	
N = 503; * 偏移等级 = 主观分层 - 客观分层			

(二) 白领新移民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因素

正如许多社会分层研究所述，主观地位认同并不是完全的主观臆测，它与社会行动者的客观情境有直接联系，主客观地位分层之间的差异也不应例外。本研究着重分析了个体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婚姻、家庭出身）、迁移变量（户籍类型、居住时间、迁出地区类型）以及客观社会地位变量（职业类别、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对白领新移民地位认同偏移状况（向上偏移、一致

认同和向下偏移)的影响作用(见表4)。在表4中,模型1-2以地位认同一致者为参照,在模型3中以向下偏移者为参照。模型的Pseudo R² (Nagelkerke)为.136, -2Log Likelihood 值为759.883, X² = 59.553 (p<.001, df=28),统计检验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模型有较好的解释力。

表 4 白领新移民地位认同偏移的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分析

影响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向上偏移/一致认同			向下偏移/一致认同			向上偏移/向下偏移		
	B	S.E.	Exp (B)	B	S.E.	Exp (B)	B	S.E	Exp (B)
Intercept	.496	.449		-1.006	.569		1.503	.550	
个体人口特征									
男性 ^a	-.140	.235	.870	.840 * *	.292	2.316	-.979 * *	.303	.376
年龄大 ^b	-.536!	.296	.585	.291	.359	1.338	-.827 *	.373	.437
已婚 ^c	.525!	.277	1.690	-.228	.357	.796	.753 *	.364	2.123
家庭出身 ^d	-.258	.230	.772	-.159	.278	.853	-.099	.291	.905
迁移变量									
户籍类型 ^e									
本地户口	.472	.300	1.603	-.191	.349	.826	.663!	.368	1.940
居住证	.186	.311	1.205	-.639!	.374	.528	.825 *	.400	2.283
居住时间长 ^f	.391	.257	1.478	-.347	.325	.707	.738 *	.326	2.091
迁出地区 ^g	-.028	.240	.973	.046	.284	1.047	.074	.297	.929
客观社会地位									
职业类型 ^h									
私营企业主	-.017	.586	.983	1.304!	.640	3.683	-1.320 *	.618	.267
管理人员	.168	.402	1.183	.364	.455	1.439	-.196	.471	.822
技术人员	.183	.250	1.201	-.002	.311	.998	.185	.325	1.203
收入水平高 ⁱ	.388	.252	1.474	.197	.313	.821	.585!	.317	1.795
教育水平 ^j									
研究生	-1.137 *	.490	.321	.207	.611	1.230	-1.344 *	.596	.261
本科类	-1.221 * *	.428	.295	-.099	.526	.906	-1.122 *	.505	.326
Pseudo R ²	.136			-2Log					
(Nagelkerke)				Likelihood					
				759.883			X ²		
							59.553 * * *		
							DF		
							28		

注：N=470；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 p<0.10, * p<0.05, * * p<0.01, * * * p<0.001。

- a 男性，以女性为参照。
- b 年龄大，指 30 岁及以上者，以小于 30 岁为参照。
- c 已婚，以未婚者为参照。
- d 家庭出身，以父母中有一方为农民为参照。
- e 户籍类型，以拥有其他类型（暂住证或其他）为参照。
- f 居住时间长，以居住时间仅 5 年及以下者为参照。
- g 迁出地区，以迁移前居住在大中城市者为参照。
- h 职业类型，以普通白领为参照。
- i 收入水平高，指月收入对数达到均数以上者，以其他人为参照。
- j 教育水平，以未受高等教育者为参照。

从个体社会特征来看,在模型1中,男性、年龄大、已婚和农民出身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87.0% (p>.10)、58.5% (p<0.10)、1.690倍 (p<0.10)和77.2% (p>.10),其中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龄小和已婚的白领新移民更可能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一

致认同”的倾向。在模型 2 中,男性、年龄大、已婚和农民出身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向下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 2.316 倍 ($p < 0.01$)、1.338 倍 ($p > .10$)、79.6% ($p > .10$) 和 85.3% ($p > .10$),其中只有性别的影响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白领新移民更可能表现出“向下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的倾向。在模型 3 中,男性、年龄大、已婚和农民出身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向下偏移”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 37.6% ($p < 0.01$)、43.7% ($p < 0.05$)、2.123 倍 ($p < 0.05$) 和 90.5%,这些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女性、年龄小、已婚的白领新移民更可能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向下偏移”的倾向 [s3]。总的来看,年龄小和已婚的白领新移民更可能出现“向上偏移”倾向;而男性白领新移民更可能呈现出“向下偏移”倾向。

从迁移变量来看,在模型 1 中,拥有本地户口和居住证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 1.603 倍 ($p > .10$) 和 1.205 倍 ($p > .10$),居住时间长和迁自小城市的白领新移民更可能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 1.478 倍 ($p > .10$) 和 97.3% ($p > .10$),然而这些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户籍类型、居住时间和迁出地区类型不同的白领新移民在“向上偏移/一致认同”上无显著性差异。在模型 2 中,拥有本地户口和居住证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向下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 82.6% ($p > .10$) 和 52.8% ($p < 0.10$),居住时间长和迁自小城市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向下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 70.7% ($p > .10$) 和 1.047 倍 ($p > .10$),然而其中只有拥有居住证与其他人之间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拥有居住证的白领新移民更可能出现“一致认同”而不是“向下偏移”。在模型 3 中,拥有本地户口和居住证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向下偏移”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 1.940 倍 ($p < 0.10$) 和 2.283 倍 ($p < 0.05$),居住时间长和迁自小城市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向下偏移”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 2.091 倍 ($p < 0.05$) 和 92.9% ($p > .10$),其中只有迁出地区类型之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拥有本地户口或居住证和居住时间越长的白领新移民更可能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向下偏移”的倾向。总的来说,拥有居住证会使白领新移民更不可能出现“向下偏移”的倾向,但拥有户口和居住时间越长都更可能使其呈现“向上偏移”的倾向,而迁出区域类型则无显著影响。

从客观社会地位来看,私营企业主、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的可能性分别是普通白领的 98.3% ($p > .10$)、1.183 倍 ($p > .10$) 和 1.201 倍 ($p > .10$),他们表现出“向下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的可能性分别是普通白领的 3.683 倍 ($p < .10$)、1.439 倍 ($p > .10$) 和 99.8% ($p > .10$),他们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向下偏移”的可能性分别是普通白领的 26.7% ($p < .05$)、82.2% ($p > .10$) 和 1.203 倍 ($p > .10$),其中私营企业主在模型 2 和模型 3 中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营企业主表现出“向下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或“向上偏移”的可能性都显著高于普通白领。从收入水平来看,收入水平高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向下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以及“向上偏移”而不是“向下偏移”的可能性分别是收入水平低的人的 1.474 倍 ($p > .10$)、82.1% ($p > .10$) 和 1.795 倍 ($p < .10$),其中模型 3 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水平越高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向下偏移”的可能性显著高于收入水平低的人。在教育水平上,接受过研究生教育和本科类教育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 32.1% ($p < .05$) 和 29.5% ($p < .01$),他们表现出“向下偏移”而不是“一致认同”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 1.230 倍 ($p > .10$) 和 90.6% ($p > .10$),此外,他们表现出“向上偏移”而不是“向下偏移”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 26.1% ($p < .05$) 和 32.6% ($p < .05$),其中模型 1 和模型 3 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新移民表现出“一致认同”和“向下偏移”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其他人,换句话说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新移民更可能表现出“向上偏移”的倾向。简

而言之，私营企业主比其他人更可能呈现出“向下偏移”倾向；收入的增加会使白领新移民呈现“向上偏移”倾向；而低学历却使其更可能呈现“向上偏移”倾向。

四、结论与讨论

（一）白领新移民的地位认同现状

前人关于我国城市居民地位认同的研究表明，城市居民整体上呈现出地位认同向下偏移的倾向（如，郭星华，2001；仇立平，2001；赵延东，2005；李培林，2005；卢福营、张兆曙，2006；董运生，2006：80；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6）。然而，本研究的结果却表明，这一现象并未一致性地呈现在白领新移民群体上：白领新移民主要表现为“一致认同”、“向上偏移”、“向下偏移”与“模糊认同”四种倾向，其中“向上偏移”几乎是“向下偏移”的两倍，但偏差程度并不十分严重。我们可以从社会认同这一社会心理机制来理解这些现象并存的原因。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阶级/阶层分化的程度可能会相当的显著，但未必导致明确的阶级/阶层意识；而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里，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使之敏感于自己的得失，更有可能导致明确的阶级/阶层意识的产生（刘欣，2001）。这意味着，当社会急剧变化时，社会地位的确认也不再是固定的，而需要人们根据实际生活境遇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进行重新评估。按照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社会行动者总要去评价和界定自身的能力和观点，而当没有客观的和非社会的手段可资利用的时候，他不得不依次去和他人的能力和观点进行比较。费斯汀格的社会比较论在逻辑上涵盖了社会学传统中的参照群体论和相对剥夺论这些中层理论模型（转引自方文，2005：45-6）。根据相对参照群体论，人们一般是根据某个真实的或想象的社会群体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或社会行为（Merton，1957，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具体到阶层认同问题上，人们可能通过选择周边生活水平较差的人作为参照群体，从而提高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估（李强，2000：182）。相对剥夺论则认为与优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会降低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然而，在费斯汀格及其拓展的理论框架中，社会比较过程的运行基于个体人格特征的人际比较，其社会性的范畴身份并没有从背景中显现出来。基于个体的群体或范畴身份的社会比较过程或群际比较过程是社会认同理论所强调的。根据社会认同理论，我属群体的评价决定于对特定的他群体的参照。这种参照依据价值-负荷的品质和特征通过社会比较而获得。内群和外群之间积极的差异比较产生高声望，而消极的差异比较则会导致低声望。通过内群/外群比较，积极评价我属群体的压力导致社会群体力图把自身和其他群体区别开来。其中，类似性、接近性和情境显著性都是决定外群可比性的变量（Tajfel & Turner，1986：16-17）。根据这些可比性变量，对于白领导新移民来说，在社会地位评价中可以作为参照的群体主要包括：原住地居民、迁入地的老移民、迁入地的农民工以及迁入地的底层居民。相对于原住地居民，迁入上海的白领新移民大多拥有更高的经济收入，这也是导致移民迁移的最主要原因；相对于迁入地的老移民，上海移民政策近年来的松动，白领新移民拥有了更多提高经济收入的机会；而相对于农民工和底层本地居民，白领新移民的社会生活水平明显更高。这可能就是“向上偏移”比“向下偏移”的人多出一倍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剥夺论”的影响效应也会抵消“参照群体论”的影响效应，从而导致人们无法明确地评估个人的社会地位，这可能是接近四成的白领新移民并没有呈现出主客观分层偏差，并且有部分白领新移民出现认同模糊的原因。

（二）白领新移民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

尽管从整体上来看，白领新移民呈现出差异性的地位认同现状，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判断，影响作用又如何呢？由于人们“对他人的地位评价——特别是对与自己无密切接触的一般他人的评价，更倾向于依据一些客观性的指标（如收入、教育、权力、职业等），这些客观性的指

标往往构成了社会整体性价值判断标准或者说社会主流价值，而人们对于自身的社会地位评价，却时常受到个人情感因素和个人特殊的境遇状况的影响”（李春玲，2005：211）。因此，结合移民群体的特点，本研究除了考虑传统的个体人口特征变量和客观社会地位变量外，还考虑了户籍、居住时间和迁出地区类型等迁移变量。结果发现：

第一，在个体人口特征变量上，年龄小和已婚的白领新移民更可能出现“向上偏移”倾向；而男性白领新移民更可能呈现出“向下偏移”倾向。对于个体人口特征的影响作用，我们可以从白领新移民的不同的特殊生活境遇来理解。首先，在本研究中，年龄小的白领新移民主要指未满30岁。结合白领新移民的高教育程度的群体特征（92.6%接受过高等教育），说明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工作不久，可比性最强的境遇是过去的学生生活，此时他们第一次感受到经济独立带来的生活水平变化，对未来充满希望。也就是说，社会境遇的纵向社会比较会使年龄小的白领新移民过高地评估自己的社会地位。其次，对于已婚的白领新移民来说，最具可比性的境遇主要有两种：一是婚前的情况，二是未婚的白领新移民。与这两种境遇相比，婚姻都意味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成本的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会相对较高，所以已婚白领新移民过高评估自己的社会地位可能是纵向和横向社会比较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后，对于男性白领新移民来说，最具可比性的群体是女性白领新移民。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白领新移民在收入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导致男性白领新移民向下认同的可能原因来自过高的社会期望。毫无疑问，人们对男性的社会期望远高于女性，这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并且，社会对男性移民的社会期望还可能更高，这一观点可以从移民国际和国内移民总是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的趋势中得到证明（赵君丽，2002；麦格，2007：133，143；段成荣等，2008）。因此，与这些过高的社会期望相比，男性白领新移民更可能倾向于向下认同自身的社会地位。

第二，在迁移变量上，拥有居住证会使白领新移民更不可能出现“向下偏移”的倾向，但拥有户口和居住时间越长都更可能使其呈现“向上偏移”的倾向，而迁出地区类型则无显著影响作用。移民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少数群体，在迁入地社会总是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排斥（张展新等，2007）。这种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户籍身份的变化之上。一方面，根据现行的户籍制度（陈映芳，2005），能持有本地户口和居住证的白领新移民，其客观社会地位显然高于社会底层群体，包括来自本地居民中的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群体，这可能是他们更不可能向下认同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现行的户籍制度所限，能够顺利实现户籍身份转换的白领新移民也毕竟是少数，与那些被排斥在本地户籍之外的大多数外来移民相比，获得本地户口的确让他们跨出了少数群体的群体社会地位，这可能是本地户口会增加白领新移民向上认同可能性的原因。同时，取得了户口才算在制度上得到了迁入地社会的认可，获得了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民权，而居住证所赋予的权力和保障毕竟是有时间限制的，这可能是拥有本地户口会使白领新移民产生向上认同而居住证并不会的原因。换句话说，户籍制度的影响作用更多体现的是白领新移民在“支配—从属”群体地位体系中的位置变化。此外，居住时间越长，白领新移民也更可能出现向上认同，这可能与伴随时间的财富积累有关。居住时间越短，他们的客观收入和财富积累相对较少，与居住时间长的白领新移民相比，其社会经济地位可能较低，但随着时间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并且还能高于那些居住时间更短的外来移民。最后，迁出地区类型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作用，这一结果表明，对于白领新移民来说，具可比性的比较对象不会来自原住地社会，而可能来自迁入地社会。

第三，在客观社会地位变量的影响上，私营企业主比其他人更可能呈现出“向下偏移”倾向；收入的增加会使白领新移民呈现“向上偏移”倾向；而低学历却使其更可能呈现“向上偏移”倾向。首先，关于收入的影响作用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渡边雅男，1998：325；仇立平，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说明收入可能是白领新移民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依据。其次，私营企业主比其他白领新移民更可能倾向于向下认同，而其他白领新移民的地位认同则倾向于一致性认同或向上认同，即归类为中层及以上阶层。这一结果

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普通白领在主观社会地位上的判断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例如,仇立平(2001)对上海职工的调查发现,“一致性上层”主要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一致性下层”主要是农民、低级服务人员和非技术工人等。李春玲(2003)通过个案访谈,发现人们的自我地位认同与社会等级分类的排列顺序相当的一致:工人归类为“最低阶层”、“下等阶层”、“低等阶层”;农民把自己归为“最低阶层”、“下等阶层”、“低等阶层”;小业主、小商人自己归类为“中间阶层”、“中产阶级”、“中下等阶层”,也有少部分自认为是“下等阶层”、“低等阶层”;一般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一般自认为是“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从中可以看出,无论个人的基本情况有多大差异,他们对各种职业地位的评价还是比较一致的,承认职业地位的差别是社会共识(仇立平,2001),大多数白领新移民也会从职业阶层来评估其社会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私营企业主却表现出向下认同的倾向。这可能是由于本次调查的私营企业主大多为小业主和小商人,他们中大多数人(78.9%)并未取得本地户口或居住证。按照“支配-从属”的群体社会地位体系,他们和农民工一样,处于从属群体地位。因此,尽管私营企业主的收入水平较高,但其群体地位更接近底层。也就是说,户籍身份可能是私营企业主评估其社会地位的依据。最后,低学历的白领新移民更可能呈现“向上偏移”倾向,而高学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更可能倾向于一致性认同和向下认同。尽管与私营企业主情况相同的是,87.4%的低学历白领新移民都未能取得居住证或本地户口,但在经济收入上,低学历的白领新移民却显著高于受到高等教育的白领新移民(其中,研究生平均4731.26元/月;本科生平均4464.23元/月,而未受高等教育的人却是6440.00元/月)。与高学历白领移民的较低收入相比,低学历者可能会认为自己的社会阶层更高。尽管学者们从总体上一再表明,客观社会地位变量会影响人们的主观社会地位判断(如刘精明、李路路,2005),但当人们面对不同的社会境遇时,其具体影响作用却会有所差别。

总而言之,尽管地区性样本和抽样方法使本研究结果在推论上有所局限,还需要获得多时间、多地点、多样本的重复稳定结论的支持。但在一定程度上,本研究通过上海白领新移民的实证数据分析,表明移民的群体社会地位和特殊生活境遇应成为理解移民地位认同的特殊框架。

参考文献:

- 蔡昉, 1996,《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春季卷)。
- 陈映芳, 2005,《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渡边雅男, 1998,《现代日本的阶层差别及其固化》,陆泽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 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 200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人口研究》,第11期。
- 董运生, 2006,《地位不一致与阶层结构变迁》,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方文, 2005,《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教新群体为例》,《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郭星华, 2001,《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期。
- 雷开春, 2008,《白领新移民与本地居民的社会支持关系及影响因素》,《青年研究》第9期。
- 李春玲, 2003,《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意识》,《湖南社会科学》第5期。
- , 2004a,《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转载自《学说连线》、《中国社会学网》,文章来源: <http://www.xslx.com/html/zlsh/shrw/2004-02-11-16019.htm>
- , 2004b,《中产阶级:中国社会值得关注的群体》,载于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05,《第四章声望分层与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差异》,《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06,《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社会学研究》第5期。
- , 2007,《城乡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期。
- 李培林, 2005,《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社会》第1期。
- 李强, 2000,《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
- 李强, 2002,《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

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友梅，2005，《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社会学研究》第6期。

刘精明、李路路，2005，《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刘欣，2001，《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第3期。

刘欣，2007，《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第6期。

卢福营、张兆曙，2006，《客观地位分层与主观地位认同》，《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麦格 (Marger Martin N.)，2007，《族群社会学》，祖丽亚提·司马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庞树奇、仇立平，1989，《我国社会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初探》，《社会学研究》第4期。

仇立平，2001，《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6，《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夏建中、张达，2003，《我国城市白领群体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河南社会科学》第9期。

谢立中，2008，《多元话语分析：以社会分层研究为例》，《社会学研究》第1期。

张文宏、雷开春，2008，《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

张永丽、黄祖辉，2008，《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来自甘肃省10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赵君丽，2002，《人口迁移的性别选择性与女性移民问题》，《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

赵延东，2005，《“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

张展新、高文书、侯慧丽，2007，《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与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来自上海等五城市的证据》，《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课题组，2004，《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Tajfel H. & J. C. Turner,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Worchel S, Austin W (eds) . Nelson Hall: Chicago, 7-24.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心理辅导中心

责任编辑：施芸卿

Key words: Post – 80's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magined Worlds Practical Worlds Vision Differences

The Research of Yield on Human Capital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Wu Xiangrong* (34)

Abstract: The paper estimates the yield on human capital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by mincer model. The estimat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yield on educ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s lower than that of urban workers but higher than that of farmers. The yield on education is higher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who are in stable occupations, in sectors and regions corresponding with more mature market than that of other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e yield on educ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who seek for jobs through government and newspaper are higher than those seeking through themselves and acquaintances. Training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com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e yield on training varies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occupational heterogeneities.

Key words: Rural Migrant Workers Human Capital Yield

Chinese Family Policies o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1980 – 2008): from “Family Support” to “Supporting Family”? *Xu Zhenning* (47)

Abstract: The article studied Chinese family policies o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ECD) from 1980 to 2008 with the method of textual analysis. The characteristics, conten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Since 1990s, the correlative policies developed fast, gradually forming a policy system covering all – around, special and single policies, which include health, education, law protect and environment of early childhood, and turn from “obligation – oriented” to “right – oriented”. But supports for families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 mostly existing correlative policies are still “family support” now because of the tradition in considering early children nurture as the obligation of family 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oeconomic.

Key words: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Family Policy Family Support Supporting Family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White – Collar New Migrants' SES Identification Deviation *Lei Kaichun* (60)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a survey of new urban immigrants in Shanghai in 2007,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white – collar new migrants' SES identification devi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most of the white – collar new migrants are in middle and lower ranks, whose SES identification appears four kinds of tendencies, namely consistent identifying, upper deviation, lower deviation and fuzzy identifying; (2) the female, the married, and the younger who have local occupancy permit or registered resident, higher income, lower education level, and live in the city longer may probably identify in upper deviation. These results reflect that the white – collar new migrants' objective SES i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migrants' special situations and ethnic group's social status.

Key Words: White – Collar New Migrants SES 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Deviation